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 广东高等教育崛起带来哪些启示

■本报记者 陈彬

在国内省域高教圈，“广东”多年来都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热词”。尤其是近几年，从豪掷百亿元支持“双一流”建设，到投资发展湾区高等教育，广东都给人一种在高教领域“一掷千金”的“土豪”感。

曾有媒体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国内各地筹建的新大学中，有十几所都来自广东。在1月13日召开的2021年广东省教育工作会议上，该省再次提出今年将有11所新建高校(校区)建成招生。

在大力建设省内高等教育的同时，广东也在吸引着大量国内高校优秀毕业生向其聚集。2019年，广东已经连续三年成为清华、北大毕业生的京外首选就业地。至2020年，该现象更是在全国大面积蔓延，广东已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就业除本省份外的第二选择，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全国名校都在给广东培养大学生”的感慨。

以上种种现象表明，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雄厚，广东高等教育的规模和质量正在迅速提升。然而，广东高等教育的崛起是否如有些人所言，仅仅是因为其“有钱”呢？除了经济因素外，是否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在支持着该省高等教育的发展？

就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长期关注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光礼。

知识经济时代， 高教是一种“经济现象”

《中国科学报》：在全国都在“为广东培养人才”的大背景下，广东却还在大力建设本省高等教育，您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周光礼：需要澄清一点，全国“为广东培养人才”的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事实上，早在10年前，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广东地方政府认为本省是没有必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因为全国人才都会在经济因素的驱动下汇聚过来。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模式曾长期支持广东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然而就在约10年前，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

彼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开始由东部地区向中部和西部推进，各地方政府也都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并开始了意识地留住人才。也恰在此时，广东开始了自身的产业转型升级，但他们突然发现，理工科方面的人才在该省出现了巨大缺口。广东省的摸底调查显示，在全国工科学目录的专业中，当时在广东设点的只有51%，而在高等教育



广东高等教育崛起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当出现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后，相关地方部门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迎难而上，主动抓住机会，而不是禁锢于原有的观念和做法，不敢迈出第一步。

的毛入学率方面，该省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广东已经成为经济与高等教育最为脱节的省份之一。

2009年以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广东省内传统的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必须要发展高端制造业。这进一步加剧了该省对优秀人才的渴求。广东在此后的几年中，开始反思并着手改变此前的高等教育发展策略。至2015年9月，广东在全国率先启动省内“双一流”计划，宣布投资50亿元建设省内“双一流”高校，随后又追加80亿元建设广东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由此，广东在持续吸引外地高素质人才的基础上，也迈出了大力发展本地区高等教育步伐。

《中国科学报》：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目前广东对于本土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发展，其实是在“补短板”？

周光礼：广东之所以能抓住这次高等教育发展的机会，其原因就在于伴随着省内产业政策的变化，其高等教育政策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由以前轻视本地高等教育，倚重外来输入，转向将本省高等教育与本地区经济发展进行高水平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的确可以视作“补短板”。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在创新驱动发展时代，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经济现象。说得再直白些，如果一个地方的经济形态是以科技密集型和产业密集型产业为主，那么其教育与经济的联系将变得十分紧密。甚至可以说，没有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就不会有一流的创新型经济体系。

高教体系须满足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广东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不惜一掷千金。此做法背后依靠的是其强大的省域经济实力。然而，对于不具备这一实力的其他省份而言，广东的做法是否就不具有可借鉴性？

周光礼：不能这样说。广东发展本省高等教育的整体布局是很值得其他地区借鉴的。

简单来说，近年来广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巨额投入可以概括为“冲、补、强”三个字。其中，“冲”是指冲一流，即保证省内被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的5所高校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具有卓越的办学水准。

“补”是指补短板。广东省高等教育体系整体不太发达，地区分布更不均衡，其粤东、粤北、粤西的很多地级市连一所本科高校都没有。补短板就是将地方“双一流”的资金引向上述地区，使省域内高等教育分布更加均衡。

“强”是指强特色。广东还有一些特色突出的高水平院校，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强特色即加强对这类高校的支持，使它们立足自身、进一步办出特色。

广东对省内高校的这种划分，对其他省份建立区域高等教育体系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要知道，这种体系划分其实与美国加州上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规划是十分类似的。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最为成功的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美国加州将其域内高校划分为三个子体系，即加州大学系统、加州州立大学系统、加州社区大学系统，分别对应顶尖的研究型高校、教学型本科院校以及社区学院等不同层次。这一划分很好地满足了加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广东的做法与此有很多共同之处。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国内其他省份是否也应该对其域内高校进行一定程度的划分？

周光礼：在经济学界有种说法，叫“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也就是说在我国，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存在四个不同的区域，即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东部沿海开放地带、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这四个不同“世界”的产业形态格局各异，其对应的区域高

等教育体系也应该是不同的。因此，对于每一个省份来说，打造满足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质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十四五”期间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广东省也做出了比较好的示范。正如前面所说，该省目前缺乏优秀的理工学科人才。所以广东省内以文科为主的传统高校，如韶关学院、嘉应学院、岭南师范学院等，目前都在进行学科调整，大力发展理工学科，向理工院校转型。这种转型是与广东经济发展需要高度匹配的。

然而，我们在西部地区却很少能看到一所大学根据当地产业形态调整自身的学科布局。类似的做法目前只在东部的广东、江苏、浙江一带出现，这点值得我们注意。

敢于迈出第一步

《中国科学报》：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目前国内人才流动日益频繁，但广东省大力发展本地高等教育的做法，似乎有违这种趋势。对此，您怎么看？

周光礼：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才流动，主要指的是少数的高端人才。此类人才的流动，往往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就造成了一种国内人才流动愈加频繁的观察感。

然而，某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恰恰是那些数量庞大的中低端技术技能人才。这种人才作为我国稳定全球产业链的“压舱石”，只能本土培养，是“流”不动的。我们无法想象企业像引进高层次人才那样，去引进一个基层技术人员；同时，外地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否符合当地企业的需求，也是一个未知数。而这也是目前广东大力发展本地高等教育的做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广东近年来大力发展本地高等教育的做法，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周光礼：面向未来，我们不但需要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还需要发展长江经济带、京津冀高科技产业园……而这些区域增长极的发展面对的问题往往并不是资金缺乏，而是思想观念是否足够开放、是否有足够的开拓精神。

广东高等教育崛起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在于当出现了一定的政策空间后，相关地方部门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迎难而上，主动抓住机会，而不是禁锢于原有的观念和做法，不敢迈出第一步。说得再直白一些，对于国家政策，地方政府究竟是采取“法不禁止皆自由”，还是固守“法无授权不可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指出本专业的专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不低于50%，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不低于50%，来自行业企业一线的兼职教师占一定比例并有实质性专业教学任务，其所承担的专业课教学任务授课课时一般不少于专业课总学时的20%，实验实训项目(任务)开出率达到100%。这就明确规定了本科职业教育理论课教学只能占总课时的50%。

在此背景下，作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环节，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中的理论课将面临更大的教学压力，其课程的设置和改革也会更加艰难，因此需要积极引导和规范教师遵循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维度。

当下，有些高职教育认知偏向实践教学，理论教学地位动摇，陷入理论课程和教学位置后移的误区，强调实践教学的极端重要性。而这种偏向实践教学的矫枉过正需要加以纠偏和补齐。

不可否认，高职教学要重构教学体系和主体内容，但理论课的核心和基础地位不能动摇。须知，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延伸，“习得”从“知道”开始起步，要充分重视并强调理论教学的重要性。回归和保证理论教学的“量与质”是优质实践教学的基础、前提和关键。

在笔者看来，目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理论课教学核心和基础均需要创新重构。本科职教只有理论教育完整、周延、充分、足够，才有可能培养出高等职业技术技能人才。此类人才的理论功底必须扎实，才有厚积薄发的潜力，真正培养高技能人才。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课程排序和位次要着力模块调组。本科职业教育课程必须合乎规程、规范和规律，课程位次排序要重新调整组合，但整体不要打乱。要坚持理论教学先行和先导，理论教学整体位次在先。只有先讲清楚、讲明白理论，才能实习、实训和实操。而“做中讲”是点拨和画龙点睛，“做后讲”是总结和提升。

本科职业教育在进入提质培优的新阶段后，其规范化要求理论课教学学时减少，教学任务繁重，压力增大，这就决定了理论课教学亟待进行全面和深度的改革。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课程门类和学习时要尽力整合压缩。高素质职业人才的知识构成要足够合理，符合基础课、专业技术基础课和专业技术技能课的“三层级”结构。本科高职理论课教学结构门类的前置课、后续课务必对应对接，每门课的学时占比、比例要匹配，设定要科学。

引导教师回归和投入理论课教学不是简单的个体行为，而是综合系统工程。创新重构必须维护理论课指导地位不动摇，模块微调必须确保课程主体结构不打乱，整合压缩必须坚守基础课群不削减，如此才能培养出厚基础、有潜质和可持续发展的学生，使其磨练成长为中国制造和制造强国的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从而承担起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任务。

(作者单位：嘉应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科层次 职教理论课改革的 纠偏与补齐

■郭伊楠

有感而发

博士当辅导员 缘何引热议

■马星宇

前不久，武汉大学的一份辅导员拟聘用名单引发公众热议，应聘的人员清一色都是顶尖大学的硕博毕业生，其中博士占了绝大多数。

公众对此的议论主要有以下几点——或惊叹社会内卷竞争如此激烈，或诧异辅导员招聘门槛如此之高，或感慨博士学历贬值速度如此之快……但究其本质，则是对博士身份与辅导员职业挂钩的质疑：辅导员招博士，有必要吗？

近年来，以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的辅导员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对博士当辅导员的议论仍然暴露出其职业化发展的困境。

在此事件上，众说纷纭的背后暗含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假设，那就是辅导员职业地位和角色并没有那么重要。而真正熟悉高等教育管理的人却都清楚，那些一线辅导员在辅导学生成长、协助教师教学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熟悉学生工作的人也知道，辅导员的工作内容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工作时间是“白加黑，五加二”，工作要求是“人生导师，知心朋友”，工作角色是“专职工作心无旁骛，兼职工作照拂不误”……辅导员对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在内的诸多学科专业有着内在的规定性。一名教师即便是博士毕业，如果不能掌握相关理论要求，也未必就能做好辅导员。同时，辅导员工作突出的实践性特征还对从事该工作的人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社会对辅导员职业的认知偏见有着一种本能的心照不宣，这或源于对传统学工管理工作的刻板印象，或本能地对专任教师群体高看一眼，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辅导员在人才培养环节中重要作用。高水平人才培养质量有赖于高水平的学生工作已是当今社会共识，而辅导员正是这一工作的关键群体。

日趋专业化、职业化的辅导员对于贯通理论教学的第一课堂、校园素质拓展的第二课堂和社会实践的第三课堂能起到穿针引线的的作用。眼下的辅导员再不仅仅是心情糟糕时的知心大哥大姐或宣讲校纪校规的婆婆妈妈，其在思想价值引领、社会实践、创新创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辅导员队伍自身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不快，标志性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果不多，仍是制约其职业形象的症结所在。这也对辅导员自身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高教观澜

从美国大学实践教授岗位的设置经验可以看出，精准育人需求是设置高校教师新岗位的基本原则。设置新岗位是一个系统工程：精准识别育人需求、精准设计岗位要求、精准吸引目标人士、精准开展岗位评价是其中的必要环节。

今年初，人社部与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创新高校教师的岗位类型，即高校在保持现有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等岗位类型总体不变的基础上，可根据自身发展实际设置新岗位类型。这是政府相关部门首次就高校教师新岗位类型提出指导意见。

笔者认为，立足需求创设新教师岗位是顺应高教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应引起有关高校以及学位点的足够重视。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能仍然是人才培养，设置新的岗位类型应该以精准育人需求为基本原则。

传统上，高校教师的岗位类型是根据教师在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岗位基本职能上的相对业绩和贡献划分的。在研究型大学，绝大多数教师为教学科研并重型(也有少数科研为主型岗位)，只有在少数学科中设置教学为主型岗位。在非研究型大学，教学为主型、社会服务型岗位有时是教师科研水平达不到要求，难以评上相关岗位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形势下，这种“形式上”是类型划分实际上是水平划分的教师岗位类型急需变化。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形势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如下特征。

一是越来越紧密的产学研联系。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要想真正提高其培养质量，

精准育人需求： 设置教师新岗位类型的基本原则

■彭旸 阮文

所学内容必须和行业产业有更全面紧密的衔接。在全球化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希望能够获得即时可用的毕业生。学生所学内容高度滞后于行业产业实际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同时，企业也希望与高校有更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遇到具体技术问题时，能有高效及时响应的智力支持。

二是越来越多的默会知识。问题解决能力是重要的可迁移能力。在行业产业中，解决实际问题仅仅依靠教科书中文字符号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更需要来自长期实践、经常使用却又不能通过文字符号清晰表达或直接传递的默会知识。我们的毕业生普遍存在的实践能力欠缺问题与默会知识的传递受阻有很大关系。

三是越来越强的应用导向。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批应用型学科与专业的兴起。如在研究生教育领域，我国大学中应用导向的专业学位教育目前招生已经超过六成。应用导向的教学需要教师自身具备应用的经验，更需要创设实际应用问题的育人环境。

从这三点看，单纯的“科研为主”“教学为主”式的一元制教师岗位类型划分已经难以精准适应人才培养新需求。时代呼唤新的岗位类型出现。这里仅以美国大学的实践教授岗位为例，介绍新教师岗位的设置是如何回应人才培养需求的。

美国一些大学在工程、法律、医学、商业或管理等学科领域中，在传统的终身岗位外设置了实践教授岗位。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将实践教授界定为“因在非学术职业生中获得的技能和专门知识而被任命的从业人员”。如康奈尔大学的工程学院聘用的实践教授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在行业或其他类似的非学术组织中担任高级技术、研究或管理职位，并在工程或相关科学技术领域拥有学士学位(硕士或博士优先)。丹佛大学的法学院聘请的实践教授在法律方面具有丰富经验，能帮助管理和监督法学院综合学业成绩项目、教授法律课程、为学生提供咨询和建议并与其他教职员工开展教学工作。

实践教授这种新岗位的设置就是为了精准适应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其聘任大体上都有以下要求：一是有一定年限的丰富从业经验，专业能力突出，在该领域具有领导能力；二是具有优秀的教学能力，能将专业领导与卓越教学结合在一起；三是能对大学的研究或创造性使命作出贡献，为有关实践的研究项目提供咨询；四是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能与大学教职员工以及公司、政府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与合作。

实践教授的设置灵活，面向行业产业。他们给人才培养带来了新鲜的经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实践教授阿莱克斯·怀廷曾

担任海牙国际刑院的起诉协调员多年。在其开设的《国际刑事法院》课程中，他运用丰富的实际经验以及专业视角帮助学生理解诉讼程序，训练他们的判断力。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系的实践教授内森·弗莱曾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和前加州议员。他与同事合作教授《加州政府与政治》课程，在地方政府竞选和选举、军事关系、反恐和公共政策等领域与他广泛的实际专长紧密结合。

实践教授能为大学和学生带来巨大的价值。他们会为学生和教职员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与具有杰出专业成就的、有经验的人互动，并从中受益。正如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大学传媒学院院长大卫·珀尔马特曾提到的，实践教授对于大学本科和硕士层次教育的成功至关重要。他们有心致力于教学并与工业界有紧密的联系，能够帮助学生认识和缩短与将来可能从事职业的距离，校外的工作经验正是他们的价值与优势所在。

从美国大学实践教授岗位的设置经验可以看出，精准育人需求是设置高校教师新岗位的基本原则。设置新岗位是一个系统工程：精准识别育人需求、精准设计岗位要求、精准吸引目标人士、精准开展岗位评价是其中的必要环节。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